

## 绪 论

自 20 世纪中叶，中外学者在呼吁学界重视翻译研究成果的同时，纷纷投身到译学的建构工作中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译学从无到有，从尴尬的角落登堂入室，几乎步入了学术殿堂的正殿，这着实令我辈从事译学研究的后进深受鼓舞。但在深受鼓舞的同时，笔者梳理了一下译学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却又倍感不安，因为我们发现，在热热闹闹的大好形势背后，确实存在着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若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并及时妥善地加以解决，很有可能会令译学这个羽毛未丰的学科停滞不前，乃至面临新的危机。

回首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颓废的工业文明留给了人们太多的思考，自然科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确立科学理性的现代精神为己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遭遇了最激烈的解构。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的经典力学继 19 世纪受到热力学的挑战后，再次受到量子力学的挑战；在哲学领域，先是尼采宣告上帝的终结，继而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主客二分的颠覆，接着又是解构主义的解构；在文学批评界，解构主义宣告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诞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翻译学，先是准备走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子，但很快就开始转向了，而且一转再转，在还没有完成建构的情况下，就遭遇了解构。

恰如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理论消解了柏拉图以降两千多年西方形而上学所固守的逻各斯（logos）中心论，打破了二元对立，动摇了结构主义一样，包括解构理论创立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内的许多学者将解构主义思想运用到翻译研究，突破了既有的思维模式，拓宽了狭隘的研究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形成了独特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文化派翻译观、后殖民翻译理论以及“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等，与描写翻译研究学派及德国的功能派一道，颠覆了中西方传统的翻译概念、原则及标准，对翻译、翻译教学及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名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笔者不仅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冲击和影响，而且深信任何一个站在大学讲台上讲授翻译课的同道，也肯定会和笔者一样感受到这样的冲击和影响。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如何面对“何为翻译”“译文要不要忠实于原文”“如何衡量翻译质量的优劣”这样一些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而众所周知，上述后起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对这些问题做出了与传统翻译理论（本书所说的传统翻译理论不是从纯时间概念上界定的，指的是自翻译研究学派以降的当代翻译理论，因而，诸如奈达的等值翻译理论并未归入当代译论之列）截然相反的回答。在颠覆与被颠覆的理论之间，我们该作何选择？选择被颠覆的传统理论，难免显得落伍，跟不上学科前沿的发展，而如果选择后起的颠覆性理论，一上来就宣称翻译无须忠实于原文，翻译就是改写，那么接下去的课就没法上了。

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时下抱怨翻译质量下滑，谴责粗制滥造现象的文章频频见诸各种媒体。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著作、科普读物，都不乏“硬伤”累累的劣译：

2004年8月24日的《南方都市报》载文指出，网友指责译林版《魔戒》系列的“《魔戒再现》、《王者无敌》两卷书中翻译错误至少也有800余处！而《精灵宝钻》更加离谱，仅仅是书后的索引（index）就可以找出179处硬伤！”

彼得·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的《形而上学》中译本中出现了将原著所引《唱赞奥义书》（*Chandogya Upanishad*）第六篇第十六章第三段中的那句本该译作“彼为尔矣”的“*That art thou*”（Van Inwagen, P., *Metaphysics*, 3rd e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8, p.47），生生地误译作了“你是艺术”（第39页）。

《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中译本将

...your judgement about his genius is perfectly well known, and his concerning you is not obscure. (Cicero, *Brutus, Orator*. trans. G. L. Hendrickson & H. M. Hubbell. London: Heinemann, 1939, p.217)

离谱地译成了：

……他确实像你所判断的那样是一个天才，十分完美，非常出名，你清楚地知道他关注什么。（《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第740页）

2008年8月23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发表了《西塞罗的愤

怒》一文，作者高峰枫在感叹“这部九百余页的译作，只要你随便翻出一页来核对，便会发觉满目疮痍”之余，担心西塞罗听到译者称“愿意耗费几年的时间译出西塞罗全部现存著作”的“消息后，会不安地从炼狱中升起，使出他修辞学作品中提到的挑动公众和陪审团‘义愤’（indignatio）的十五种‘激怒法’，把译者和出版社一起告上学问的法庭！”岭南大学荣休教授刘绍铭先生读罢高峰枫《西塞罗的愤怒》后，亦在2008年9月14日的《苹果日报》上撰文《为西塞罗叫屈》！

时隔不到一年，高山杉又在2009年6月7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的书评，批评了把“Mencius（孟子）”误译成“门修斯”<sup>①</sup>、把“Chiang Kai-shek（蒋介石）”误译为“常凯申”<sup>②</sup>之类的笑话。其实，这样的笑话还远不止于此，如把“Pearl S. Buck（赛珍珠）”不恰当地译成“帕尔·布克”，把“Bentham（边沁）”不恰当地译成“本瑟姆”等。又譬如金海军在2005年第5期的《学术界》上撰文指出《法和经济学》一书的译校者除了“显然不具备法学（尤其英美法学）的知识基础，相关之处，错译频仍”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硬伤”，如：

To illustrate from a classical book on the art of war, the Chinese philosopher Sun Tsu writes, “When your army has crossed the border [into hostile territory], you should burn your boats and bridges, in order to make it clear to everybody that you have no hankering after home” (Sun Tzu, *The Art of War*, section IX, part 3). (Cooter, Robert & Thomas Ulen, *Law and Economics*, 3rd ed.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2000, p.187)

为说明起见，我们引用中国哲人孙中山先生在经典著作《战争的艺术》一书中所写：“当你的军队已经突破界限（进入敌方领地）时，你应该烧掉船只和桥梁，以使所有人明白他们已经无退路可走”。（《法和经济学》，第162页）

①指 Anthony Giddens 的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中译本中的一句译文：“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可以适用于所有大型帝国所建立的界域。”（《民族—国家与暴力》，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9页），译、校者把 Mencius 误译成了“门修斯”不说，还以讹传讹把《孟子·万章章句上》所转引的孔子之言“天无二主，民无二王”当作了孟子格言。

②该书中还有很多类似值得商榷之处，如把“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译作“费尔班克”。

不仅如此，原文给出的引文出处在中译本注释中也译成了“桑·图：《战争的艺术》，第9节，第3部分”（《法和经济学》，第191页，注释6）。

这样一来，“Sun Tzu（孙子）”就先后被译成了两个人——“孙中山”和“不知何方神圣的‘桑·图’”，尽管这里的英文原文有误（将“Sun Tzu”误拼作“Sun Tsu”了），但这个错误非常明显，加上引文后还注明了出处，所以不至于让人误会成是不同的两个人。稍微细心一点就会发现，前面明明交代后文引用的是中国哲人著作，怎么到了后面注明出处时却成了一个看似外国人的“桑·图”的著作了呢？由于不知道 Sun Tzu 就是孙子，自然也就不会想到 *The Art of War* 并非什么《战争的艺术》而是《孙子兵法》了；《孙子兵法卷下·九地篇》自然也就变成“桑·图：《战争的艺术》，第9节，第3部分”了；“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也就译成“当你的军队已经突破界限（进入敌方领地）时，你应该烧掉船只和桥梁，以使所有人明白他们已经无退路可走”了。

高山杉还在2009年12月1日的《东方早报》上以《学者翻译名著连“庚子赔款”英文名都认不出》为题指出了尉迟酣（Holmes Welch）著《中国佛教的复兴》（*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一书的译者所犯的种种错误，其中错得最离谱的就是把“庚子赔款”（Boxer indemnity funds）译成了“车载斗量的保障基金”。

同样，《塞涅卡三论》的中译本也有很多问题，仅举一例示之：

To remind you how true this is, I would like to take an example from your own family. Our deified Augustus was a mild prince—if you begin your judgment with his principate. Admittedly, while the commonwealth was still ruled in common with others, he did wield the sword. At the very age which you are now, eighteen years old, he had already plunged his dagger into the bosom of his friends, already plotted to assassinate the council Mark Antony, already been a partner in the proscriptions. (Cooper, J. M. & J. F. Procopé (eds.), *Seneca: Mercy. Moral and Polit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38)

为了证明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想从您的家族中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神奥古斯都是一位仁慈的君主，可他在少年时却鲁莽气盛，喜欢到处耀武扬威。在他十八岁那年，即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们国家还处在前三头统治时期，他用剑刺死了一些朋友，并图谋暗杀马克·安东尼领事，后来他被流放了。（《塞涅卡三论》，第21页）

短短的一段文字，不仅有译错的地方，如把“To remind you how true this is”译作“为了证明我说的都是真话”就不得要领，原文中的“this”指的是上文中作者讲的那番道理，“true”也不是什么“真话”，而应当作“正确的”或“言之成理的”解，否则，给人的感觉是作者想要证明的只是自己没有说假话，可后面所举的例子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Our deified Augustus was a mild prince—if you begin your judgment with his principate.”一句译作“我们的神奥古斯都是一位仁慈的君主，可他在少年时却鲁莽气盛，喜欢到处耀武扬威”，前半句“我们的神奥古斯都”虽大意不错，但不如译作“我们神圣的奥古斯都”来得地道，后半句则纯属胡译，“his principate”指其元首统治，整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以其元首统治来得出判断的话，那么我们神圣的奥古斯都算是一代仁君。因而什么“少年时却鲁莽气盛，喜欢到处耀武扬威”完全是无中生有。后面的译文也错得离谱，原文明明说了“while the commonwealth was still ruled in common with others”，即与别人一道统治国家时，可译者却偏偏译成了“我们国家还处在前三头统治时期”，屋大维（后尊称奥古斯都）18岁时“前三头”早就不复存在了。其实，这里讲的是他在实行元首制一人大权独揽之前，与安东尼（Mark Antony）、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结成的后三头同盟统治时期，另外，把“马克·安东尼”降级为“领事”也是胡来。更为错误的是，最后还说什么“后来他被流放了”，原文说得明明白白：“(he had) already been a partner in the proscriptions”，即他参与了“公敌榜”行动。这样一来，用“公敌榜”来清除异己、流放自己政敌的人反倒成了“被流放”的人了。试改译如下：

臣拟以皇上自己家族的一个例子来提醒皇上一下，微臣所言，绝非无稽之谈。若从其独掌天下的那段时间来看，神圣的奥古斯都堪称一代仁君；可当初他和别人一起执掌政权时，却大开过杀戒。他像皇上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就是刚满18岁时，就已经把匕首扎进朋友的胸膛了，就已经打算用见不得人的手段侧面袭击执政官马克·安东尼了，而且他还参与了“公敌榜”行动。

此外，即使一些名作名译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譬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可以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无可挑剔的译文，哪怕像余光中和李文俊这样的名家的译文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仅以小说开头第一段中的一句话为例：

But after forty days without a fish the boy's parents had told him that the old man was now definitely and finally *salao*, which is the worst form of unlucky, and the boy had gone at their orders in another boat which caught three good fish the first week. (Ernest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可是，过了四十天没有捉到一条鱼，孩子的爸妈就对他说，老头儿现在一定“背运”了（那是形容倒霉的一个最坏的字眼）。他们吩咐孩子搭上另一只小船到海里去，在那只船上，头一个星期就捉到了三条好鱼。（海观译）

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男孩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终于“倒了血霉”，这就是说，倒霉到了极点，于是男孩听从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吴劳译）

可是一连四十天都没捕到鱼后，孩子的父母就说，这老头这是晦气，倒霉透顶。孩子听从吩咐，上了另一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黄源深译）

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捉不到鱼，那男孩的父母便对他说，那老头子如今不折不扣地成了晦气星，那真是最糟糕的厄运。于是男孩听了父母的话，到另一条船上去，那条船第一个星期便捕到三尾好鱼。（余光中译）

但是四十天没捕到一条鱼，那男孩的父母就告诉他说这老头子确实一定是晦气星——那是一种最最走霉运的人——于是孩子听了父母的吩咐，到另一只船上去打鱼，那只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三条好鱼。（张爱玲译）

但四十天没捕到鱼，男孩的父母对他说，这老人现在绝对是个衰神，倒霉到了极点；受他们吩咐，男孩去了别的船，那船第一个星期就抓到三条好鱼。（李继宏译）

可是在一连四十天都没能打到一条鱼后，男孩的父母便对儿子说，老人此刻无疑是在遭逢致命的 *salao*，也就是说正在倒凶险的血霉，便令儿子上另一条船去帮忙，才去一个星期，那条船便打到了三条上好的大鱼。（李文俊译）

撇开别的不论，单说最后那半句话“...which caught three good fish the first week”中的“three good fish”，这么多译本中居然除了李文俊译本译对了之外，全都误译成了“三条好鱼”（余光中译本略有区别：三尾好鱼）。其实，“good”一词并非只有“好”的意思，韦氏词典中有“of a noticeably large size or quantity”的解释，牛津词典中也有“fairly large”的释义，即便不查词典，译成“三条好鱼”也让人匪夷所思，因为说“三个



好人”可以理解，但“三条好鱼”就说不通了，莫非鱼和人一样，也有好坏之分，再怎么也说至少应该译作“三条不错的鱼”。

像上面这样饱受诟病或指责的误译、劣译的例子，时下可以说还有不少。由此可见，二十多年前，已故季羨林先生因为“读了一些翻译的书籍……核对了一下原文，发现了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原作者说东，译者说西；原作者没有说的，译者却说了”，而态度鲜明地指出“我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如果有的现代的翻译理论，不管多么深奥，竟能容忍这种现象，这种理论就是邪说谬论，必须坚决批判、扬弃”<sup>①</sup>，进而“吁请全体翻译工作者关心翻译质量”的呼吁并未得到响应。

问题是，面对像季羨林、高峰枫和高山杉那样的指责时，译者似乎大可以用当今的一些译学理论来加以反驳或为自己辩护：凭什么指责我译错了？不知道意义的不确定性吗？你有你的理解，我也可以有我的理解。再说了，人家不是告诫我们译作没有忠实于原作<sup>②</sup>的义务吗？就算我译错了又如何？我不译，原作不就死了吗？所以，是我的翻译使得西塞罗的原作再生了，他谢我还来不及呢？用得着你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吗？用得着你来为他鸣冤叫屈吗？当然，面对这样的反驳与自我辩护，提出这些理论的学者也许会说，这是对他们理论的歪曲，那么问题又来了：他们自己的理论是具有确定性的，是不能曲解的。而且，虽然误译可能是由于水平不够而造成的，不应当与学者们所倡导的刻意“误译”相混淆，但笔者想说的是，这些学者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至少缺少明晰的表述，或者说没有把二者区分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理论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缺陷。中外翻译史上都能找到类似于严复、傅雷、斯皮瓦克和许渊冲那样的“不忠实”，而这类“不忠实”应该说才是解构派等翻译理论所提倡的，但这类“不忠实”与我们上面所举的这样一些误译究竟如何加以区别或界定，却缺少相应的论述。

不可否认，包括功能派、解构派、文化派在内的当代西方译学确实取得了很多颠覆性的理论成果，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译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原则和标准。这样的颠覆或曰突破也许单就理论本身而言无可厚非，但却苦了我们这些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也会使翻译评价和翻译批评失去

① 季羨林，《吁请全体翻译工作者关心翻译质量》，载《中国翻译》，1995（4），4页。

② 中文里有时亦称“原著”，英文中较传统的说法是“the original”，后来一般用“the source text”，最新的说法叫“the start text”（见 Anthony Pym, *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4），该书第1版中用的还是“the source text”。

依据。事实上, 这些理论甚至还给译学界带来了不小的困惑, 有的学者抱怨现在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已然出现了一道鸿沟 (a yawning gap), 如伯格伦德 (Lars Berglund)、辛格 (Rajendra Singh)、巴拉德 (Michel Ballard)、切斯特曼 (Andrew Chesterman) 及瓦格纳 (Emma Wagner) 等都认为翻译研究与实践之间已经有了一道鸿沟。伯格伦德曾对译学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西德诸大学的翻译学者按时下的路子进行的翻译研究, 对于他们自己之外的圈外人士而言, 几乎没有得出什么有益的成果。”<sup>①</sup> 切斯特曼指出: “翻译研究研究翻译、翻译作品, 同时越来越多地研究翻译过程。因此, 眼看实际从事翻译的人士似乎要将翻译研究裁决为不着边际、玄而又玄的胡扯, 担心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sup>②</sup> 辛格认为翻译理论似乎在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 “这些年来, 翻译学者们的努力一直有增无减, 好书也是一本一本在不断推出, 尽管其中有一些实际上可能并不属于翻译学。”<sup>③</sup>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 翻译学或许是唯一似乎未把精力倾注在自身理论问题上的领域。”<sup>④</sup> “当代翻译理论, 在我看来似乎不是关于翻译的理论。”<sup>⑤</sup> 翻译研究 “将其重点置于外围”<sup>⑥</sup> “忽略问题的核心”<sup>⑦</sup> “韦努蒂 (2000) 编的那本书没有收录一篇探讨我称之为核心问题的新文章”<sup>⑧</sup>。

诚然, 翻译学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向之后, 研究的视野似乎越来越宽

① Lars O. Berglund. (1990). The Search for Social Significance. *Lebende Sprachen*, 35(4), 145–151. 原文为: With the current approach, translation studies of the kind pursued at West German universities produce few results to people outside the community formed by the translation scholars themselves. (p.148) 引文 (除注明的外), 均为笔者自译。

② Andrew Chesterman. (1999).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Prescriptivism. *Folia Translatologica*, (6), 9–19. 原文为: Translation Studies studies translation, translations, and increasingly also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There is therefore some cause for concern when the people who actually do the translating seem to find Translation Studies irrelevant, metaphysical nonsense. (p.9)

③ Rajendra Singh. (2007). Unsafe at Any Speed? Some Unfinished Reflections on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n Paul St-Pierre & Prafulla C. Kar (Eds.), *In Translation: reflections, Refractions, Transformations* (pp.73–8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原文为: Translation scholars have been trying harder and producing some good work, though some of it may actually not belong to TS. (p.73)

④ Ibid. 原文为: TS is perhaps the only field in the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 that seems NOT to focus on theoretical questions of its own. (p.73)

⑤ Ibid. 原文为: Contemporary TT seems to me not to be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p.83)

⑥ Ibid. 原文为: put its centre on its periphery. (p.75)

⑦ Ibid. 原文为: ignore the heart of matter. (p.76)

⑧ Ibid. 原文为: Venuti (2000) does not contain any recent contributions dealing with what I am calling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p.76)



了，似乎不再纠缠于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恰如王宁所言：

在一个“文化”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难以摆脱“文化”的阴影。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圈外人”的兴趣，从而使得翻译研究的疆界也在大大地扩展。我们从这些来自圈外的学者的著述中很难见到以往的传统翻译学研究者所使用的那套术语，而是不断地见到一些与文化密切相关的新术语。因而一些恪守传统观念的翻译研究者不得不拍案而起，试图捍卫传统的翻译研究的“纯洁性”和严肃性。这种善良的本意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样一个跨文化和跨学科的信息时代，翻译本身的定义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一个学科要保持旺盛的活力，就必须不断自我更新方法和理念，以适应变动不居的时代需要。这样看来，如果翻译研究仍像过去那样仅仅吸引少数专家的注意，那它就永远也摆脱不了“边缘化”的境地。过去被人们认为是“伪翻译”或“译述”或改写的东西也许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这对于我们这个学科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想现在就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sup>①</sup>

可以说王宁教授的这段文字简要地勾勒出了当今的译学现状，显然，现在的译学研究存在着两大对立阵营，一为“外围”学者阵营，一为传统翻译学研究者阵营。虽然王宁教授认为现在对“外围”学者的加入对翻译学这个学科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通观全书，我们发现王宁教授其实还是持乐观态度的。对此，笔者完全赞同，但同时又觉得有必要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这些“外围”学者的研究应不应该为传统翻译研究学者所认同，而是传统翻译研究学者能不能为掌握着当今翻译学话语权的“外围”学者所接纳。

在笔者看来，囿于文字层面或者语言层面的传统研究视域固然过于狭隘，但它仍然且将永远是译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另一方面，过分强调其核心地位甚至不承认“外围”学者的研究，确实不利于学科建设，也不能构成系统的翻译学。纵观近二三十年国内外翻译研究界的情形，虽不乏“理论突破”，但这些突破在很大程度上大多是昙花一现，转眼间就为新的“突破”所突破了，而且很难得到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士的认可。恰如詹姆斯·鲁尔（James Rule）在论及社会科学理论时所言：

<sup>①</sup> 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公众就对社会科学开始持怀疑态度, 究其原因, 似乎是因为一种全然不信任的看法, 即就算社会科学家们完全终止其理论探讨活动,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一个让人听了很不舒服的看法, 但决不能因此而不拿它当回事儿。倘若我们这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打算捍卫自己的研究工作的话, 就应该拿出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成果给非专业人士。<sup>①</sup>

总的说来, 前一段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 纷纷都想颠覆前人思想和理论的种种当代译学理论正在逐步引起人们的反思或质疑。也可以说, 这些颠覆性的理论似乎自身也面临被颠覆的命运了。而在笔者看来, 在学科建设上, 动辄颠覆或者推倒重来的心理是不健康的, 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所以, 对于目前遭到质疑的那些颠覆性理论, 我们要做的不是对它们进行简单的再颠覆, 而是借用解构主义的方法对既有的各种翻译理论进行一番梳理、解构和批判性研究, 尝试着指出这些理论在回答译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在质疑与解构这些颠覆性的理论之前, 我们首先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是否知道这些理论创立或产生的背景? 是否误读了这些理论? 是否了解这些理论与传统翻译理论之间的根本分歧及造成这些分歧的原因之所在? 是否清楚这些后起理论之间的脉络关系与异同? 其中哪些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 哪些则动摇或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 那些颠覆性的理论又是如何颠覆传统翻译观的? 也许只有对上述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之后, 我们才能回答孙艺风提出的那个问题——“翻译学的何去何从?”<sup>②</sup>

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 西方当代译论在本书中主要指翻译研究学派以降的各派西方译论, 尤金·奈达等人的译论虽然只比这些理论早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但由于其对于翻译的性质、原则等问题的回答只能算传统译论之集大成者, 是后起的诸派理论纷纷加以质疑与颠覆的对象, 因而并未归入当代译论的范畴, 而是算在了传统译论之列。

① James B. Rule. (1997).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原文为: Underlying the public skepticism of social science since the 1970s appears to be a profoundly mistrustful perception—to wit, that rather little of value *would* be lost if social scientists' pursuit of their theoretical programs were simply suspended. This is a harsh view, but that is no reason not to take it seriously. If we social scientists are prepared to defend our work, we should certainly have some account to give as to what its longterm results offer to nonspecialists. (p.16)

② 孙艺风,《翻译学的何去何从》,载《中国翻译》,2010(2),5~10页。

如上所述,一方面,当代西方译学确实极大地拓宽了译学研究的视野,突破了传统译论拘泥于文字层面的转换技巧,将译前与译后这两个传统译论所忽视的诸多因素如文化、意识形态等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使得译学研究从微观走向了宏观,并具备了人文意味,从而也使得这门学科由边缘而步入了中心。可以说,各个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传统译论提出了挑战,有的甚至动摇或颠覆了传统译论;而另一方面以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译学所取得的这些成果虽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肯定,却因为其研究对象越来越泛化,呈现出了“将其重点置于外围”“忽略问题的核心”的局面,造成了译学研究新的瓶颈,而为真正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甚至是翻译家所不屑。就是在译学界内部,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反思了。别的姑且不论,就拿前不多时由《中国翻译》《东方翻译》杂志发起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办的“何为翻译——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高层论坛来说吧,从论坛的名称即可看出,对于“何为翻译”这一问题都尚需重新定义,可见译学在理论建设上并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究竟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是该冷静地进行批判性研究的时候了。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当代西方译学对传统译论中的哪些基本概念和原则进行了怎样的解构与颠覆。

描写翻译学派四个代表性人物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图里(Gideon Toury)、勒菲弗尔(André Alphons Lefevere)和赫曼斯(Theo Hermans),把翻译纳入了一个更大的系统来加以考察,强调制约翻译的各种因素,如译入语文化(target culture)系统的社会准则与文学规范、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系统、主流诗学等。由于看到了诸多影响或决定翻译成败的因子,因而势必动摇传统的翻译定义和翻译标准,如图里认为只要两个语篇之间有某些关系,其一就是翻译,<sup>①</sup>勒菲弗尔与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更是称“翻译就是对原文的改写”,<sup>②</sup>就是对原文文本的“操纵”或“摆布”(manipulation)。在这一点上,描写翻译学派与解构派、功能派、文化派的观点都是不谋而合的,但是与提倡异化策略的韦努蒂的观点却是截然相反的。

① Gideon Toury. (1980).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Tel Aviv: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pp.14-15.

②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2004).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In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p.vii).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功能派，也称目的派，代表人物为卡塔琳娜·赖斯（Kantharina Reiss）、汉斯·弗美尔（Hans J. Vermeer）、尤斯塔·霍尔茨-门泰里（Justa Holz-Mänttari）和克里斯蒂安妮·诺德（Christiane Nord），其主要主张就是目的决定一切，译文忠不忠实于原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对翻译的定义，动摇了传统的翻译原则。

而真正可以用“颠覆”来形容的还要数解构派翻译理论，它与后来的文化派理论一道，颠覆了传统的翻译概念，如借用解构主义理论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的文本理论，尤其是互文性理论，夸大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否定原作的终极地位，进而否定了翻译的忠实原则。解构派翻译理论的源头可追溯至海德格尔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解构派翻译理论的形成或传播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学者包括本雅明、罗兰·巴特、德里达、保罗·德曼（Paul de Man）等。韦努蒂也一直被视作解构派翻译理论的代表性人物。

面对当代西方译学的这些新理论，我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新的便是好的，来自外国的就是对的，不加审视地全盘接受，不问这些解构性与颠覆性的回答是否真的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翻译观、揭示出了翻译活动的真谛且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这种“立言必炫逞洋腔，出语则标榜夷调，万言不见新意引颈，累卷无非旧语重抄……生搬硬套西洋理论”<sup>①</sup>的学风在国内译学界并不鲜见，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和反省。

弄清楚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究竟含有多少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性认识，又含有多少似是而非或以偏概全之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重要的翻译活动的本质，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人文、经济、政治、科技等种种交流，最终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sup>①</sup>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5页。

# 既有解构性批评研究评析

对于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解构性批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多,除了赵彦春<sup>①</sup>对文化派翻译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曹明伦<sup>②</sup>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进行综合性批评的同时指出了国内学者对这些理论的误读以及李龙泉<sup>③</sup>对解构派翻译观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之外,国内学者批评得最多的是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有鉴于此,我们这里不妨先从这方面谈起。

### 2.1 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批评

孙艺风在其专著《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中指出韦努蒂“过度关注翻译对于塑造文化身份的‘巨大力量’,并不恰当地夸大了翻译对外来文本的接受、反应,乃至对某个国家的态度。如此的泛意识形态化,对翻译学的认知并无帮助”。<sup>④</sup>张景华在专著《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中指出了韦努蒂翻译主张中的泛政治化倾向,认为其“后果就是把翻译过程中正常的语言转换、感情表达和意义传递都置于政治斗争的框架中,拒绝承认翻译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具有客观规律的活动”。<sup>⑤</sup>谭载喜在《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中针对韦努蒂所倡导的异化策略提出了一连串引人深思的问题:在我们认为其“异化翻译理论”代表了一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和阻抗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换一个角度来印证一下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即反其道而行之,把强势的英美语言与文化译入某种发展中的非洲语言,而不是把非洲作品译入英语。如果在这个转换了方向的语境中,我们按“异化”原则移植了英美源文本的异族特

① 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② 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 李龙泉,《借鉴与批判:解构主义翻译观专题研究》,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④ 孙艺风,《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⑤ 张景华,《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征,所产生的结果会不会同样被看作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假如因为强势的英语变成了源语、弱势的非洲语变成了目标语,而把原本提倡的“异化”主张修正为“归化”主张,以彰显对“阻抗”殖民文化入侵的考虑,那么这会不会意味着其倡导的“异化”只适用于把英语作为目标语的翻译?<sup>①</sup>受此启发,李枫、田德蓓在《解构还是重塑: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了其异化翻译理论“是将外译英作为一种‘默认语境(default context)’……暴露了韦氏理论的一个缺陷——单向性”。<sup>②</sup>贺显斌在指出“韦努蒂的论述不但史料不足,有时还回避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材料,影响了其说服力”的缺陷的同时,还指出其“异化译论的最大问题是将翻译策略和社会文化效应混为一谈,前者属于文本层面,后者属于社会政治和互文层面”。<sup>③</sup>杨镇源在《论韦努蒂的文学翻译伦理思想之局限性》一文中也认为“意识形态只是翻译伦理的一个维度而已,不能成为它视野中的唯一焦点。如果过分集中于意识形态,而缺乏对其它维度的足够重视,我们便可能放任翻译游离语言文字,进而使其彻底沦为权力斗争的场所。这样的结果无疑将淡化翻译批评与文化政治批评之间的界线,对翻译研究学科身份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sup>④</sup>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如此众多,为什么唯独韦努蒂的遭到批评最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韦努蒂的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异化”策略或“抵抗性”翻译的倡导,而“异化”策略又与国内学者所熟悉的“直译”或“欧化”多少有一些联系;二是国外早已有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根茨勒(Gentzler)、提莫志克(Tymoczko)、塔里克·莎玛(Tarek Shamma)等学者对韦努蒂的异化理论提出过十分尖锐的批评:

韦努蒂标榜其异化理论与实践是在抗击资本主义,因为在他的想象里,社会语境中有两股对立势力在对抗: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欲将霸道的流畅准则强加在每个人,尤其是所有译者头上;而反抗资本主义的高雅文化则欲以各种异化形式进行反击……在他看来,凡是霸权势力令其使之流畅的就是流畅而已,凡是令其使之成为蹩脚、“文笔拙劣”或“翻译腔”的,

①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5页。

② 李枫、田德蓓,《解构还是重塑: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再思考》,载《中国比较文学》,2012(4),32页。

③ 贺显斌,《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局限性》,载《外国语》,2007(3),77页。

④ 杨镇源,《论韦努蒂的文学翻译伦理思想之局限性》,载《当代文坛》,2013(6),38页。



他都会加以“异化”而拔高，可是他挑战的并不是这种霸道行为本身，而只是其副产品——流畅与不流畅文本——的相对社会价值。“劣”译虽被重新定义成了“佳”译，可它们的文本属性却并没有改变，而文本的属性是由韦努蒂希望抵抗的霸权势力潜意识里，也可以说是其意识体细胞，所赋予的。<sup>①</sup>

根茨勒在认同罗宾逊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批评，可以说与谭载喜的批评异曲同工，但更为一针见血：

韦努蒂所偏爱的翻译形式对于挑战美国国内的某些文学传统虽然不无益处，但用于其他国家和文化时，则未免会有助长暴力策略与倒行逆施的策略，使得压迫与殖民赖以继续之嫌。<sup>②</sup>

继提莫志克在《后殖民语境中的翻译：早期爱尔兰文学的英译》一书中以其对早期爱尔兰文学的英译的个案研究，在韦努蒂所提倡的异化翻译上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事实上，字斟句酌的文献考据式翻译都是在打着准确的旗号，通过将文学文本变成，比方说，非文学文本的方式，行文

- 
- ① Douglas Robinson. (1997). *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Kent: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原文为：...in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reignism Venuti claims to be combating capitalism. As he conceives the social situation, there are two conflicting forces at work: dominant capitalist mass culture that would impose hegemonic norms of fluency on everyone, especially all translators, and resistant anticapitalist high culture, which would fight back with various forms of foreignism...In his view, what hegemonic forces coach him to reify as fluent is fluent. What those forces coach him to reify as awkward or “bad writing” or “translationese” he revalorizes as “foreignizing” but he does not challenge the reification, only the relative social value of its by-products (fluent and nonfluent texts). “Bad” translations have been redefined as “good” translations, but they still have the same textual properties they were subliminally (ideosomatically) assigned by the hegemonic forces Venuti wants to resist. (p.109)
- ② Edwin Gentzler. (2002). Transl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wer. In Maria Tymoczko & Edwin Gentzler (Eds.), *Translation and Power* (pp.195–218).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原文为：Though useful for challenging certain literary convention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applied to other countries and cultural situations, Venuti’s favored form of translation might appear to be perpetuating violent and abusive strategies that have served to oppress and colonize. (p.206)

本殖民之实”<sup>①</sup>——之后，提莫志克又在《翻译与政治参与：行动主义、社会变化及翻译在地缘政治变迁中的作用》一文中对韦努蒂的理论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批评：第一，术语不统一，概念界定模糊，且是刻意为之，旨在为其留下种种回旋余地。第二，其论述在行文上很不严谨，有时甚至粗枝大叶，喜欢下断言却不加以论证或举出例证，譬如他声称流畅是美国当下最重要的翻译标准，却几乎没举出什么例子加以证明，即便“文化优势会导致译文在文本与文化表现形式上走样变形，为占统治地位的译入语文化利益服务”，但“这样的变形并不见得只与一种翻译方法，如流畅译法，有关。相反，任何一种译法，哪怕是异化译法，都可以变成文化殖民的工具”。第三，其抵抗概念前后不一，难以让人们得出与他相同的结论。第四，其抵抗式翻译或异化翻译等概念连可复制性与迁移性这一必要条件都不具备。第五，他采用的是描述的翻译研究方法，但最终走的却是规定主义路子，而且是很强硬和专制的规定主义路子，因而是把我们的翻译研究引向倒退而不是前进。提莫志克还就其指责韦努蒂术语界定不清进行了具体说明，如一篇译文中究竟要有多少抵抗成分，要异化到何种程度才算异化，对此韦努蒂都没有说清楚。虽然她也承认这样的问题听上去可能有鸡蛋里挑骨头之嫌（may sound like nitpicking），但她还是认为，“如果谁都可以来定标准，那么何以成为可靠理论和研究的基础？”<sup>②</sup>

在《异化策略的异奇之维：〈伯顿的天方夜谭〉译本》一文中，塔里克·莎玛对伯顿“具有东方情调与色彩”、保留了“东方思维与语言习惯”的《天方夜谭》译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援引多方面的材料证明伯顿的译

① Maria Tymoczko. (1999).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p.259. “Thus, in philological translations the literature of the other culture is reduced to non-literature and segments of world literature come to be represented by non-literature.” 此处所引的文字为其在“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ctivism, Social Change and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Geopolitical Shifts”（见本页注释②，p.32）一文中的重新措辞，原文为：In fact, philological translations colonize texts by taking literary texts, for example, and turning them into non-literary texts, all in the name of accuracy. 其中 philological translation 又称 learned translation，属于典型的异化翻译。

② Maria Tymoczko. (2000). Transla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Activism, Social Change and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Geopolitical Shifts. *The Translator*, 6(1), 32-35. 其中引号内的原文为：...cultural dominance results in translations with deformed textual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at serves the interests of the dominant receptor culture. Such deformation is not necessarily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single type of translation method, such as fluency. Rather, any translation procedure can become a tool of cultural colonization, even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pp.32-33); “...if the determination of standards is open to anyone, can this be the basis of sound theory and research?” (p.35)

本是韦努蒂所倡导的异化译法的典型，不仅在内容上做到了原汁原味地传达，而且在形式上也是亦步亦趋，指出虽然少数不喜欢这种异化译法的评论家甚至称“完全可以把伯顿的译本不算在英文书籍之列”，因为它“古俚夹杂，不堪卒读，美式说法比比皆是，而且通篇雕琢堆砌，不是老掉牙的陈词滥调，便是不顺耳的洋腔怪调”，但大多数评论家却对这套异化得不能再异化的译著不吝溢美之词，其受欢迎的程度更是译者始料未及的，尽管定价不菲，高达每本1英镑，但还是供不应求。伯顿直痛悔当初没把价定得再高一点，最后干脆决定自行出版，16卷花了6 000英镑，毛收入16 000英镑，净赚了10 000英镑。莎玛用事实说话，证明了韦努蒂称异化译法不受欢迎的说法并不靠谱。与此同时，莎玛还认为韦努蒂在论及维多利亚时期的翻译时，只谈了翻译荷马史诗的弗朗西斯·纽曼（Francis Newman, 1805–1897）和翻译维吉尔诗歌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却对同样采用异化策略的另一派译者避而不谈，这是失之偏颇的。更为偏颇的是，他还以维多利亚时期包括纽曼与莫里斯在内的少数几个采用异化策略、反对流畅归化译法的译者的译作没有得到大多数评论家的肯定，未能在文学界得到一席之地，而草草得出了一般性结论。而事实上，除了大受欢迎的伯顿译本外，《天方夜谭》的另两个也近乎是全译本的英译本，译者分别为雷恩（Edward William Lane, 1801–1876）和佩恩（John Payne, 1842–1916），采用的也都是直译法，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且同样也很受欢迎。此外，莎玛还指出，过分异化的译法会令译文读者觉得“他者”怪异得不可思议，反而觉得自身文化的价值观才是正常和可以接受的。其结果便是非但不能抵制我族中心主义、文化自恋和文化帝国主义，反而会适得其反。最后，莎玛还举了埃多阿多·克莉萨弗里（Edoardo Crisafulli）研究卡里（H. F. Cary）所译但丁《神曲》的英译本中的一个例子，介绍了一些学者对韦努蒂所攻击的归化策略的看法，认为归化策略也可能同样易受先在表述形式的影响，换言之，也会受到原文作者的感染而使译文带有异质成分或陌生感。<sup>①</sup>

也许是为了回应这些批评，韦努蒂后来在《翻译之困：迈向存异伦理》中将原来的归化与异化策略上升到了伦理层面，提出了存异伦理

① Tarek Shamma. (2005). The Exotic Dimension of Foreignizing Strategies: Burton's Translation of the Arabian Nights. *The Translator*, 11(1), 51–67. 其中所引原文为：...proclaimed that one should “place Captain Burton's version quite out of the category of English books,” for it is “an unreadable compound of archaeology and ‘slang,’ abounding in Americanisms, and full of an affected reaching after obsolete or foreign words and phrases”. (p.60)

(ethics of difference)、求同伦理(ethics of sameness)及因地制宜伦理(ethics of location)。他首先一如既往地肯定了其倡导的异化策略,并以反对译者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归化翻译的两个作家为例支撑了自己的这一观点。这两个作家一个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他因不满译者的归化译法而终止了二人长达四年之久的合作;另一个则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他对其小说《笑话》的两个英译本都非常不满,原因自然是译者都采用了过度归化的译法。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韦努蒂轻描淡写地肯定了昆德拉质疑归化译文强行把外国文学作品同化为本国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抹杀了其具有翻译价值的异国风味之后,笔锋一转:“然而,再什么样的异国风味,不通过另一种语言,说白了,也就是不通过另一个时代与国度的品味,又何以在译文中表现出来呢?对于一个对文体效果如此在行的作家而言,昆德拉对翻译的见解是非常幼稚的。他以为外国文本的意义在翻译过程可以原封不动,外国作家的意图可以原汁原味地穿越语言与文化界线……换言之,译文所干的就是一项归化工作,这是无法避免的。”<sup>①</sup>继而,他又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归化策略的积极作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往往是全球和本土潮流的一种混杂体,因此,即便看似采用最保守的归化策略的翻译,换言之,也就是采用旨在强化在译入语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本土传统的翻译,也能够对霸权价值观进行修正”。<sup>②</sup>至此,似乎给人以他又站到自己的对立面去了的感觉。然而,如果真这么认为,那就错了。因为最后,他说得很明确,“就基于这些差异的翻译伦理而言,关键问题并非仅仅是一个话语策略问题,也即流畅还是抵抗的问题,而且还始终是翻译的意图与效果,说白了,就是翻译是否实现了促进文化革新与变

① Lawrence Venuti.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原文为: Yet how can any foreignness be registered in a translation except through another language—i.e. through the taste of another time and country? Kundera's thinking about translating is remarkably naive for a writer so finely attuned to stylistic effects. He assumes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foreign text can avoid change in translation, that the foreign writer's intention can travel unadulterated across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vide...Translations, in other words, inevitably perform a work of domestication. (p.5)

② Ibid. 原文为: Since the domestic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ends to be a hybrid of global and local trends, translation can revise hegemonic values even when it seems to employ the most conservatively domesticating strategies—strategies, in other words, that are designed to reinforce dominant indigenous traditions in the translating culture. (p.189)

化这一目的的问题”。<sup>①</sup>也就是说,他已不再单单是从策略的层面来衡量翻译的好坏与优劣了,而是要把从伦理的高度看翻译是否遵循因地制宜的伦理、实现了这一目的作为衡量尺度了。如此一来,对于缺乏本土文学传统的文化而言,“出版社出版发行归化得更彻底的霸权文学译本,经过一番改头换面,将它们同化、吸收到本土的价值观中来,就像加纳人所译的《奥德赛》契维语译本那样,可以促进口头传说向现代文学的转变,这显然不失为一种重大的文化变革”<sup>②</sup>,因而符合求同伦理要求的归化策略便是值得肯定的策略了,而对于“富于文化传统的次要文化”而言,“追求极端本地化的翻译就是在冒强调同质性之险,而对同质性的强调可以在消除外国文本文化差异的同时,寻思并鼓励族群和宗教的原教旨主义”<sup>③</sup>,因而它又成为不宜提倡的策略了。在这一点上,刘亚猛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韦努蒂对“翻译伦理”的讨论所采用的是“后结构主义‘分两步走’的基本话语策略:首先将翻译思想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二元对立颠倒过来,使其反面转为正面,然后通过对新构筑的对立的自我解构最终革除二元对立本身。提倡异化翻译,将归化翻译打入另册只是他分两步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的第一步。在将传统的‘归化/异化’对立颠倒过来的同时,他开始挖因此而形成的‘异化/归化’对立的‘墙脚’,最终将翻译伦理原则定于‘一尊’,即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翻译,凡能因地制宜促进文化更新和变化的就是好翻译。”<sup>④</sup>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韦努蒂异化理论的批评远不止上述文献,但观点大多不说雷同也很近似,有的甚至有抄袭之嫌,譬如有一篇论韦努蒂翻译理论局限性的文章基本上就是用上述提莫志克和莎玛等学者的文章拼凑而成的,故不再一一讨论。此外,笔者想说的是,虽然已有的批评都很有见地,但笔者以为,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还存在一个鲜有人论及的缺陷,而正

① Lawrence Venuti.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原文为: For a translation ethics grounded in such differences, the key issue is not simply a discursive strategy (fluent or resistant), but always its intention and effect as well—i.e. whether the translating realizes an aim to promot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hange. (p.188)

② Ibid. 原文为: Publishers that issue more extensively domesticated translations of hegemonic literatures, assimilating them to local values through revision (the Twi Odyssey), may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from oral traditions to modern literatures, clearly a momentous cultural change. (pp.188-189)

③ Ibid. 原文为: translation that pursues an extreme localization risks a homogenizing emphasis that may reflect and encourage ethnic or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s while eliminating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foreign texts. (p.189)

④ 刘亚猛,《韦努蒂的“翻译伦理”及其自我解构》,载《中国翻译》,2005(5),44页。



是这一缺陷才使得其不得不借助解构策略来阐述其理论，却依然未能解决其理论前后矛盾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参见 4.4，此不赘。

## 2.2 三部解构性批评论著评介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赵彦春、曹明伦和李龙泉的三部专著。

赵彦春在推出《翻译学归结论》之前，已于 2003 年在《外国语》和 2004 年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分别发表过《对“摆布派”译论的译学反思》一文与《文化派的理论取向与实质》一文，由于此两文已分别纳入《翻译学归结论》第一章第一节和第六节，因此无须单独探讨。

在肯定文化派摆脱语言的局限而上升到文化与翻译的互动，拓宽了翻译学研究范围之后，作者笔锋一转，马上指出，“学术的根本不在于研究范围的宽窄，而在于本质问题的求解。”<sup>①</sup>虽然作者承认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因为文化中蕴藏着驱动和制约翻译的本质性的东西，但纵观全书，他对文化派的理论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指出了其理论取向的不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对待传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不是批判地继承，而是颠覆、瓦解、抛弃；2）他们从外部因素切入所作的关于翻译本体的一切见解和结论几乎都是偏颇的、错误的；3）他们关于外部因素本身的论述也是不无问题的，体现为逻辑混乱和夸大事实两个方面。进而用一章的篇幅围绕以上三点展开了充分的论证。恰如为该书作序的廖七一教授所言，“其间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在当前的翻译研究界尚不多见”<sup>②</sup>。另一位序作者，已故的杨自俭教授对于书中对文化派理论的批评也用了“冷静而深入”来形容<sup>③</sup>。该书难能可贵的是在批评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归结主义方法论设想，运用关联理论构建了有效的翻译模式，并以两章的篇幅用大量的实例验证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由于超出了本书此处的主旨，就不细述了。

该书对于译学研究中很多根本同时也是众说纷纭的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如在论及理解与传达的问题时，作者首先指出：“翻译依然要满足那古老的，也是最基本的要求：正确的理解与准确的传达。”进而赋予了理

① 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6 页。

② 见廖七一为赵彦春著《翻译学归结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年）所作的序，第 15 页。

③ 见杨自俭为赵彦春著《翻译学归结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年）所作的序，第 6 页。